

——关于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及其他

刘宗棠*

贵州先贤李端棻是清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对于清末的维新变法和教育改革事业做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过去有一段时期，他却被忽视，被遗忘。改革开放以来，对李端棻的研究和宣传逐渐增多。进入 21 世纪后，贵州省，尤其是贵阳市曾经用多种形式纪念李端棻。今年是李端棻逝世 110 周年，我们重新阅读他的《请推广学校折》，重温他的一些重要事迹，会得到很多新的启迪和感悟。

一、屡建奇功，曾被遗忘——李端棻人生的辉煌与遗憾

在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和教育改革的前前后后，李端棻做出了很多独特的贡献，屡建奇功。1889 年，李端棻主考广东乡试，非常赏识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即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此后十年间，梁启超到京师多寄住在李端棻府上，并得以结交各界名流，大大地提升和扩大了活动空间。1894 年，甲午战败后，光绪帝“欲兴庶政而图自强”，降旨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济时用之才”。不料时过数月，应者寥寥。唯李端棻竭力保荐了 16 位俊彦维新之士，其中有唐才常、熊希龄、严修、夏曾佑等。1896 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是戊戌变法教育改革的方针，后来被称为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纲领性文件。1898 年，李端棻向光绪帝上奏，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并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这其实是一份政治改革的纲领。1898 年 7 月，李端棻被授职礼部尚书，负责掌管全国教育行政和其他相关事务。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以“滥保匪人”被“着即革职，发往新疆”。1901 年，李端棻

以年老多病，被赦回黔，时年已 69 岁。但是，他仍然热心教育，传播新学，应聘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席，参与举办贵州省通省公立中学堂、贵州省公立师范学堂等。临终前还竭力捐资助学。1907 年 11 月 17 日，李端棻与世长辞，终年 75 岁。

对于李端棻在变法维新和教育改革中的独特贡献，康、梁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梁启超说：“李端棻屡上封事，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大誓群臣诸大事，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故上特拔为礼部尚书。”^①康有为称赞李端棻当时是“抗疏维新冠九卿”，后来又在悼念李端棻的祭文中说：“维新之艰难兮，公缔其始。”又说：“策变法而累抗疏兮，发维新之大旨。”（《祭李端棻文》）^②《清史稿·戊戌变法传论》曰：“戊戌变法，德宗发愤图强，用端棻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遽起，激成政变。”^③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李端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被“忽视”，被“遗忘”。《李端棻评传——兼论维新官僚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作者钟家鼎教授说：“作为朝廷大臣，李端棻能够直接就国家大事与光绪皇帝对话。作为梁启超的老师和姻兄，李端棻能够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密切合作。李端棻成为打通光绪皇帝、维新官僚、康梁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人物，是被后世忽略的一位戊戌变法领袖人物。”

去年（2016 年）是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120 周年，今年（2017 年）是李端棻逝世 110 周年，明年（2018 年）是李端棻安葬于贵阳大关口（现贵阳市乌当区永乐

* 作者简介：刘宗棠，男，1931 年生，贵州省毕节市人，原贵阳学院教授，长期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指物论〉与指号学》《论“承认”》《再论“承认”》《三论“承认”》等。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65 页。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 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33-634 页。

③ 转引自钟家鼎：《李端棻评传——兼论维新官僚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海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8 页。

乡水塘村大关口) 110 周年。这些都是应该隆重纪念李端棻的年份。

现在，我们重新认真阅读李端棻上的《请推广学校折》，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李端棻忧国忧民的赤诚和锐意改革的决心。

二、抗疏变法，锐意维新——《请推广学校折》的积极意义

上疏是在朝官员向皇帝进呈奏章的一种文书形式。清代官吏向皇帝奏事的文书，用折本缮写，叫作“奏折”，也叫“折子”。抗疏指的是向皇帝上书直言。在戊戌变法时期，李端棻向光绪上了一些很重要的折子，其中最著名的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的上《请推广学校折》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的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前者讲教育改革，后者讲政治改革，这正是戊戌变法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内容。

后来，百日维新失败，但由《请推广学校折》而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却保留下来。“京师之有大学堂也，始于中日战后，侍郎李端棻奏请立学，中旨报可……及政变，惟大学以萌芽早，得不废。”（《清史稿》）而且，慈禧在谕旨中也说：“大学为培植人才之地，应予继续兴办。”于是，京师大学堂成了“戊戌变法”诸多新政中的幸存者。这所大学堂的建立，意义非常重大。它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标志，其最大特色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引进和吸纳西方近代的文明和科学文化。1912 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此后，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学术传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而且，百日维新后，不仅京师大学堂幸存下来，各地建立起来的若干新学校也没有被解散，而是继续作为传播新思想、培育新人才的基地，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此后的改革、革命和建设，推动了我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

显而易见，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非常重要，它是中国学制近代化的先声，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纲领性文件。

三、“时事多艰，需才孔亟”——上《请推广学校折》时的形势

《请推广学校折》的全部内容都概括在开头的二十一个字中：“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八字，就非常鲜明地说明了当时形势的紧迫。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予当时“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社会以巨大的冲击。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对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其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用实际行动开始学习西方的技术。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一些人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是不够的，还应该深入地多方面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变法经验、教育思想和学校制度等，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师夷之长技以自强”。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受到更进一步的大震动。进步国人认识到必须做进一步的更全面的改革。这种改革强烈地表现为戊戌变法运动。

彼时，主张变法的人士大都认为革新教育是变法的根本大计，而教育革新首要的就是废除八股，兴办学校。康有为说：“尝考察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①梁启超说：“变法之本在于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②然而，当时康梁等人的言论只是在野人士的呼吁，人微言轻，不能对国家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也有不少朝廷官员提出有关开办新式学堂的奏折，例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就都上过有关开设某种新式学堂的折子。^③但是，这些奏折都只是就个别的学堂进行论述。对推广学校问题集中进行全面论述的，当属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

《请推广学校折》一开始就提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关于“时事多艰”，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并未详加论述。对“需才孔亟”，则进行了扼要而且精准的论述：“皇上顺穷变通久之义，将新庶政以图自强，恐办理无人，百废莫举，特降明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之士，所在咸令表荐，以备擢用。”本来期望很美好，“以为豪杰云集，富强立致。”实际情况却距离原来的期望很远，“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即有一二，或仅束身自好之辈，罕有济难瑰玮之才，于侧席盛怀，未能尽副。”那么，原因何在呢？“夫以中国民众数百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

国难当头，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这就是当时的形势。

四、顶层设计，一经五纬——《请推广学校折》的主要内容

面对“时事多艰，需才孔亟”的严峻形势，《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了“一经五纬”的教育改革措施：“一经”指“设官书局”，“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设“大学堂”；“五纬”则是为了配合推广新式学校教育的五项辅助措施，即设藏

① 《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148页。

② 《戊戌变法》（三），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21页。

③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28-143页。

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以及选派学生到外地和外国游历、学习。

《请推广学校折》首先深入剖析了“教之之道未尽”的事实和原因。实际上，当时已经开设了一些新式学校，“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皆有。”

那么，为什么还说“教之之道未尽”呢？李端棻提出以下五点：

其一，“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这是说教学的内容单一，只是学习西语西文，却未学习“治国之道，富强之原”等更重要的内容。

其二，“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外，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这里特别指出物理、化学和工业制造等学科的特点和要求，提出学习不分专业，不重视长期实践，是不行的。

其三，“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指出学习科学有的需要试验测绘，有的需要游历察勘，这与过去只从“故纸堆中”读书，不注重实践，大不相同。

其四，“利禄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成弃材。今诸馆所教，率自成童以下，苟逾弱冠，即已通籍；虽或向学，欲从末由。”指出科举取士与新学教育之间的矛盾。学生或耽于功名而无意于新学，或欲学新学而无门。

其五，“巨厦非一木所能支，横流非独柱所能砥……今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士之欲学者或以地僻而不能达，或以额外而不能容，即使在馆学徒一人有一人之用，尚于治天下之材，万不足一。况于功课不精，成就无几。”指出新式学堂学生太少，成材率不高，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

最后，李端棻总结道：“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余年，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惟此之故。”此外，李端棻还特别提出：“格致、制造、农、商、兵、矿诸学，非若考据、词章、帖括之可以闭户獭祭而得也。书必待翻译而后得读，一人之学，能翻群籍乎？学必待游历而后证实，一人之身，能履群地乎？此所以虽有倜傥有志之士，或学焉而不成，或成焉而不大也。”

在贴合实际深入分析了“教之之道未尽”的原因之后，李端棻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的办法。

首先，他高度赞赏“设官书局于都畿，领以大臣以重其事”。因为必须有充足的优良的学习资料才能很好地学习，而且有了充足的优良的学习资料供人学习，就有了希望。“他日奇才异能由斯而出，不可胜数也。”

所谓“官书局”，其实早在咸丰末年，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就已出现。到同治、

光绪年间，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热心洋务的封疆大吏也积极筹资举办。1895年，维新派的强学会所办的强学书局被清政府改组为官书局，译刻各国的政治、商务、工程等书籍。1898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之所以李端棻高度赞扬“设官书局于都畿”，是因为由此能够提供大量的新学资料给学习者。

其次，“惟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作人之风当偏于率土。”李端棻还郑重提出“推广学校”的主张。“臣请推广此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他还由低到高，分别提出了各级学堂的不同要求、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初级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以三年为期。”中级学堂：“省学选诸生二十五以下者入学，其举人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等，以三年为期。”高级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监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此外，还要安排分斋学习，并安排好学成后的出路，“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他认为在这样周到的安排下，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如此，则人争濯磨，士知向往，风气自开，技能自成，才不可胜用矣。”

当然，这里的课程安排，仍然是先诵国学、辅以西学，虽然仍旧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在“西学为用”中，已经非常重视引进西方的新知识、新技能，比以往传统的书院大有进步了。从出路上看，虽然还是参照“科第”的资格，但也是适应当时社会思想惯性的一种办法。

这样大幅度的教育改革，“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规格宏大，需要大量的经费，大量的师资，怎么办？“今国家正值患贫，何处筹此巨款？”对此，李端棻也有调查研究，并根据当前的现实，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他说：“臣查各省及府、州、县率有书院，岁调生徒入院肄业，聘师讲授，意美法良。惟奉行既久，积习日深，多课帖括，难育异才。”原来各地都办有书院，但是已经大大地落后现实需要，亟需改革。“今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这样就首先解决了办学场地的问题。关于经费，则“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因旧增广，则事顺而易行；就近分筹，则需少而易集”。考虑得很实际，安排得也比较周到，切实可行。另一方面，还要保证重点。“惟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示天下以朴，似当酌助帑藏以崇体制，每岁得十余万，规模已可大成。中国之大，岂以此十余万为贫富哉？”一定要下些本钱，认真办好京师大学堂。

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要办这么多的学堂，从哪里去找这么多师资？这也

只能从现实出发，逐步解决。李端棻说：“臣以为事属创始，学者当起于浅近，教者亦无取精深。今宜令中外大吏各举才任教习之士，悉以名闻，或就地聘延，或考试选补。海内之大，必有可以充其任者。”这里的办法是从现实出发，循序渐进充分运用现有资源，积极努力，逐步解决问题。

设立学堂，非常重要。但是，仅仅设立学堂还不够。“然课其记诵而不廓其见闻，非所以造异才也。就学者有日进之功，其不能就学者无讲习之助，非所以广风气也。”因此，还需要有相辅相成的一些措施，“今推而广之，厥有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者，盖数端焉”。于是，他提出以下五项措施（即所谓的“五纬”）：

“一曰设藏书楼也。……自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板及各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书，由地方公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

“二曰创仪器院也。格致实学，咸藉试验。无远视之镜，不足言天学；无测绘之仪，不足言地学；不多见矿质，不足言矿学；不习睹气机，不足言工程之学；其余诸学，率皆类似。”首先，简洁精到地指出新学的特点，指出仪器的重要。然后提出：“今请于所立诸学堂咸别设一院，购置仪器，令诸学徒皆就试习……而学徒所成，视昔日纸上空谈，相去远矣。”

“三曰开译书局也。……近年以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已百余种，可谓知所务也。然所译之书，详于求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日所亟应讲求者，一切章程条理，彼国咸有专书详言之。今此等书，悉无译本。又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异岁殊，后来居上。今所已译出者，率十年以前之书，且书亦甚少，未能尽其所长。”针对上述情况，“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工商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不厌详博，随时刻布，廉值发售，则可以增益见闻，开发才智矣。”这里，他强调的是既要全面翻译西方的各类书籍，又要与时俱进，关注西方的新成果，并即时传布开来。

“四曰广立报社也。知今而不知古则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则为腐儒。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若读报，二者相须相成，缺一不可。”他认为当时非常需要既博古又通今的人才，因此既要鼓励努力读书，也要倡导积极阅报。“今请于京师及各省会，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咸立大报馆，择购西报之尤善者分而译之。译成，除恭缮进呈御览并咨送京外大小衙门外，即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其各省政俗土宜，亦由各馆派人查验，随时报闻，则识时之俊日多，干国之才日出矣。”当时对新闻和信息的重要性有这样的认识，更表明了他与时俱进的思想。

“五曰选派游历也。学徒既受业数年，考试及格者，当选高才以充游历。游历之道有二：一游各国，肆业于彼之学校，纵览乎彼之工厂，精益求精以期大成；一游历各省，察验矿质，钩核商务，测绘舆地，查阅物宜。皆限以年期，厚给薪俸，随时著书，归呈有司，察其切实有用者，为之刊布，优加奖励。”当然，有奖也要有罚。“其游惰

而无状者，官则立予降黜，士则夺其出身。”

李端棻对于这“一经五纬”的改革方案满怀信心。他说：“夫既有官书局、大学堂以为之经，复有此五者以为纬，则中人以上者，比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十年之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上以恢列圣之远猷，下以慑强邻之狡启，道未有急于是者。”

这封《请推广学校折》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实际，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有关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考虑周到，切中时弊，集中体现了当时维新派的主张，可操作性很强。1896年6月12日上奏后，8月11日，光绪帝谕内阁：“李端棻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折，着该衙门议奏。”不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兴学诚自强本计，请由各省督抚酌拟办法，或就原有书院，量加程课；或另建书院，肄习专门。……致所请京师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请飭下该管大臣，察度情形筹办。”^①基本上都赞同李端棻的意见。

如此一来，经由总理衙门议奏认同，光绪皇帝批准的《请推广学校折》的意见，便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维新变法进行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不久以后，这份奏折经《时务报》刊登而广为流传，成为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和其他相关文教事业的根据。

五、传播新学，至死不渝——李端棻晚年讲学、办学、助学事迹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也以“滥保匪人”被革职，遣戍新疆。是年秋天，李端棻被押解离京，赋诗曰：“怕呼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后来，到了甘州（今甘肃张掖），因病留下治疗。

1901年，李端棻以年老多病，赦回贵阳。1902年，贵州巡抚聘李端棻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习。李端棻仍然努力传播西方新学，为了推广新的学习内容，写了《普通学说》一书，帮助大家学习西方新学。其中说道：“为学之最初一步，普通学是也。西人谓之文学、质学。质学，东人又谓之科学，凡人类应有之智识悉具于是。学校用者谓之教科书，程度之高低，则随学校之大小而异。不明普通学不能学专门，欲求专门之大成，则普通学之程度亦须随之提高。”^②最后还开列了普通学的一些书目，其中有算

^① 《戊戌政变》（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4页。

^② 转引自钟家鼎：《李端棻评传——兼论维新官僚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术、几何、代数、地理、历史、地质、理化、生理、博物、政治、经济、法制、伦理、教育等。^①

李端棻在主讲经世学堂时，第一次月课就让学生写论说文，出题为“卢梭论”，并且把自己所藏的《新民丛刊》上的卢梭传记给大家传写抄阅。第二次月课，又出题为“培根论”，又把所藏《新民丛刊》中有关培根的传记给大家传写抄阅。在讲学中，李端棻还介绍一些西方的学术思想，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李端棻积极传播新学的言行，受到顽固派分子的强烈反对。当时，贵阳街头出现了一些诽谤李端棻的竹枝词，例如：康梁遗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又如：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清。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②但是，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沉重压迫下也只得继续开展新政，包括改革官制、兵制、学制，奖励工商等诸多方面。

1902年，贵州巡抚邓华熙奏请将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并下令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于是，贵州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办学热潮。李端棻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倡导作用。

同年，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创立了贵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1935年更名为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1957年更名为贵阳市师范学校，2007年并入贵阳学院）。

1906年，李端棻与任可澄等创办贵州省第一所公立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1950年与贵阳中学等几所中学合并成为贵阳一中）。同年，李端棻与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对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2004年出版的《贵州教育史》记载：“从1897年改革学古书院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贵州取得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办起各类学校1700多所（《贵州省志·教育志》据民国《贵州通志》的统计为683所，近年搜集到的资料，已超过700所），其中小学堂658所，中学堂14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19所，高等学堂6所，

① 转引自钟家鼎：《李端棻评传——兼论维新官僚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346页。

② 转引自钟家鼎：《李端棻评传——兼论维新官僚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页。

实业学堂 12 所。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军警学堂 5 所。”^①

清末贵州的地方教育得以如此蓬勃发展，当记一笔李端棻的首倡之功。

直到去世前，李端棻仍然心系当地教育。1907 年，他虽已年逾古稀、步履艰难，但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的一些学堂，并竭力捐资助学。他去世前数月，还给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写信说：“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现在读来，这份赤子之心，依然令人感动。

1907 年 11 月 17 日（丁未年十月十二日），李端棻逝世，享年 75 岁。

^① 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7 页。

教育改革视角下的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分析

敖以深*

戊戌变法时期，李端棻以其特有的政治地位为变法措施的施行做出了许多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奏《请推广学校折》，对国家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建议。因此，对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及其教育改革思想进行研究，无论是对深入了解维新教育，抑或是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极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题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近代教育改革的视角，以《请推广学校折》为研究材料，对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进行系统探析。

一、《请推广学校折》蕴含的教育改革思想

1896年6月12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李端棻向光绪帝上《请推广学校折》。该折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系统地表述了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具体内容分析如下：

（一）重视选拔举荐人才

选拔举荐人才是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立足点。在李端棻看来，只有兴学育才，才是救亡图强的根本。《请推广学校折》开篇就说：“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①

* 作者简介：敖以深，男，贵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后方抗战史、贵州地方史等。

①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强调有用人才对于国家强弱的重要性，希望统治者实施变法以图国家自强，在全国范围内寻求通达内外能周时用的人才。“巨厦非一本所能支，横流非独柱所能砥，天下之大，事变之亟，必求多士，始济艰难。”^①他认为求才困难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创办的学校数量不足，招收的学生数量有限，于治天下之才万不足一。甲午战争以后，面对光绪帝降诏求贤而“应者寥寥”的局面，李端棻深感忧虑，发出了“夫以中国民众数万

①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7 页。

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①的哀叹。

李端棻不仅呼吁要重视培养人才，而且还以实际行动尽量举荐人才。戊戌变法期间，他积极向光绪皇帝举荐人才。据统计，从甲午战争失败后到百日维新，“经他向光绪皇帝保荐的维新派重要人物达 16 人之多，其中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修、唐才常、熊希龄等。光绪皇帝之重用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李端棻极力保荐之功实不可没。”^②

（二）主张大力推广学校

推广学校是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李端棻认为，人才的形成需要学校的教育和培养，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学校是人才形成的有效培养路径，学校数量太少是造成当时人才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使国家多出奇才异能之士，他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③在当时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可令每省每县各改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④

他还指出，学校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仅靠学校教育还不能满足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为此，他主张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凡与学校有益相须而成者，亦须推广讲求。只有整合各方资源，通过多种形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才能够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

（三）呼吁改革传统科举制度

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在封建社会人才培养选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制度发展到清末，其弊端日益暴露，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质疑。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教育理念的传播，改革传统科举制度的呼声更加高涨。李端棻吸收了经世致用的观点，主张吸收西方教育之长，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

据记载，他出典广东乡试时，给考生的考题共有四道：1.“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

①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6 页。

② 熊宗仁：《甲午战争与贵州知识分子的觉醒》，《贵州文史丛刊》1994 年第 5 期，第 2 页。

③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7 页。

④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8 页。

“子不语怪力乱神”；2. “来百工则财用足”；3.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4. 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①可以看出，这些考题与一般帖括考辨有所不同，隐含“经世致用”之意，具有策论的性质。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他主张改革学习课程及学习内容，认为省、府、州、县学堂所学课程，除中国典籍外，应开设各国语言文字、天文、与地、算学、格致、制造、农桑、兵矿、时事、交涉等科目，既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重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科。其实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二、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原因分析

《请推广学校折》集中体现了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并非偶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的反映，同时与教育救国思潮的发展，以及他自身对封建制度特别是传统科举制度弊端的深刻认识紧密联系。

（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演变中对教育的思考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逐步加剧，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瓜分我国领土的野心，给我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在《马关条约》换约后不久，光绪帝就发布了一道上谕，决心痛除积弊，以收自强之效，并降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之士”。鉴于民族危机的日益激化和光绪帝“将兴庶政，以图自强”，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身任刑部侍郎的李端棻以自己的特殊地位，公开主张维新变法”。^②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

（二）新兴教育救国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在近代中国如何振兴的思考和探索中，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的重要作用。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为挽救危局，各派势力纷纷将目光转向教育。维新派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康有为等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兴办近代教育对救亡图强的重要意义；洋务派官员胡燏芬、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认为“西方之强，强以学校”，主张“兴学育才”^③，通过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来实现国家自强。在清朝政府官员中，部分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如陶模就在《培养人才疏》中强调，国家的强弱与人才有密切关系，请求国家多培养人才，勉图补救。

① 秋阳：《李端棻传》，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 页。

② 熊宗仁：《甲午战争与贵州知识分子的觉醒》，《贵州文史丛刊》1994 年第 5 期，第 2 页。

③ 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760 页。

在各种各样的教育救国主张中，对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众所周知，李端棻与梁启超之间是姻亲关系，“他们二人不仅思想相通，而且在维新变法运动中配合默契”，“梁启超在京师时，常至李府聚首，二人娓娓谈西学，侃侃论新政”。^①甚至有人认为：“李端棻是与梁启超‘共谋’兴学的重要人物，‘请推广学校’之举亦有梁启超的参与。”^②由此可见，李端棻和梁启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三）对传统科举制度弊端的深刻认识

李端棻通过科举入仕，曾出督云南学政，累擢内阁大学士，四为乡试考官，一为会试副总裁。特殊的社会经历使他深知科举制度专注考试、忽视教育的弊害。李端棻指出，在传统科举制度下，“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③对于京师同文馆等洋务学堂，李端棻认为它们只单纯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化，“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加之“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等因素，仍然未能达到教育改革的目的。^④此外，李端棻还认为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存在理论与实际严重脱离现象，不能致精，终成空谈，无以致用，导致国家长期培养不出真正的有用之才，造成了人才匮乏的局面。

三、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的历史影响

由于李端棻奏的《请推广学校折》所体现的教育改革思想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因而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部分条款内容在戊戌变法时期付诸实施，特别是京师大学堂的建立等，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反映了近代中国教

① 熊宗仁：《甲午战争与贵州知识分子的觉醒》，《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5期，第2页。

② 秋阳：《李端棻传》，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③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④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请推广学校折》为戊戌变法中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据

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内容具体，主张清晰，观点明确，对教育现象的分析切中时弊，所提改革建议具有可操作性，引起了总理衙门官员和光绪皇帝的高度重视。戊戌变法时期，《请推广学校折》推广学校的主张及其所包含的教育理念部分得以实施，该折也几乎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主要依据。

1896年，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后不久，该折便刊登在上海《时务报》第七期上，流传甚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同。该折经光绪皇帝批阅后，命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大体采纳了李端棻的主张，认为“兴学诚自强本计，请由各省督抚酌拟办法，或就原有书院量加程课，或另建书院肄习专门。果使业有可观，三年后由督抚奏明再行议定章程，请旨考试采用。其藏书楼、仪器院、译书馆三节，均可于新立学堂中兼举并行。选派游历一节，与臣衙门奏派同文馆学生出洋章程大意略同……至所请京师建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请飭下该管大臣，察度情形筹办”。^①在此之后，梁启超所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以及孙家鼐所拟各条陈，其内容都与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基本一致。戊戌变法时期，在光绪帝发布的“诏定国是”诏书中，明确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还下令“将各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在光绪帝最后一道新政上谕中，还决定拨出巨额经费作为开办京师大学堂的经费。光绪帝颁布的这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虽是维新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基本上与《请推广学校折》内容相一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深深地打上了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烙印。

（二）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深远影响和参考价值

李端棻因为奏《请推广学校折》而备受人们关注，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以及随后的系列教育改革举措的实施，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我国近代教育的体制，不仅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端棻在奏折中明确提出将各省各县书院改为学堂，形成国家、省、地方多层次

① 迟云飞：《清史编年》第十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办学的局面。府州县学、省学、京师大学堂均以三年为期，大学、省学分专业，“分章讲习”。戊戌变法时，光绪帝下诏改书院为学堂，省会设高等学堂，府厅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堂。这样，在全国形成了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体制。这种初步构想，特别是呼吁建立京师大学堂，主张选举贡监生入学深造，对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发展和高等学校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也有学者指出：“先生折中的议论，不惟切中时弊，对当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陋习，不啻振聋发聩。且其所请具体办法，实事求是简便易行，既为变法革新及时培养了人才，推动了维新事业的发展，并初步奠定了我国近代教育的规模和体制。故此举不但是维新变法的一大成就，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①

戊戌变法后不久，李端棻回到贵州，在贵阳积极创办新式学校，大力传播新式教育理念，对推动贵州地方教育发展做了重大贡献。

当前，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正面临着培养创新人才和普及基础教育等重大问题，深入研究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吸取其精华，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事业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① 转引自钟家鼎等：《论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5期，第40页。

对李端棻规训后学的学术性考证

余文武* **

作为身在旧体制内却站出来挑战旧体制的李端棻，被梁启超称为是“二品以上言新政者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他曾替康有为代奏《上清帝第五书》，曾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改革派进入晚清中枢的密荐者，曾上呈《请推广学校折》和《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两个重要奏折，曾在戊戌变法的紧要关头取代守旧派大臣出任礼部尚书，曾在归隐后创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师范学堂之一——贵阳公立师范学堂^①，曾与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等同列“松筠十君子”……可是，李端棻为何做出以上离经叛道之举，从京师清流一跃而成维新派干将？就此，多学科学者均在潜研精思其间的道理。不过，他慧眼擢拔梁启超又反受其广譬曲谕的多方开导，他跟出使东洋的黎庶昌与出使西洋的张荫桓相视莫逆，他在数十年的若干学政任上奖掖后进挖掘人才，以及蛰居贵阳与乡贤毕力同心而共赴事功的殊勋异绩，是作者见猎心喜的学术旨趣所在。

“规训”一词出自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福柯，具有纪律、惩戒、训练、学科等多重含义，也是教育学研究的概念之一。在本文中引作学术训练，特指先知先觉率马以骥、同志同僚能者居先的姿态，以及对于后学政治上的引领与学问上的提点之意；后学即学问居于人后之后进学者。本文假定李端棻自入仕起即日就月将，精进不休，以一个精明强干的开明政治家形象示人，拥有旷达不羁的胸襟、高明过人的思想与才德兼备的品格，在多地的学政任上对莘莘学子三熏三沐，而后重任在肩仍勉力对同道同僚发蒙解惑，再而借助学堂讲堂力行金玉良言的教化，其道德文章与嘉言懿行足以成为当朝当世的楷模。作者将审读事关李端棻规训后学与知识生产的材料，作李端棻研究文献的“文籍先生”，规避之前盲信的单文孤证，考证李端棻规训后学、诱掖后进、

* 作者简介：余文武，1970年生，贵州湄潭人，贵阳学院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近期主要进行教育学学科规训和李端棻研究。

**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项目（项目编号：2017ZD011）。

① 刘学洙：《李端棻：一部改革者的大书》，《当代贵州》2006年第1期，第61页。

开办新学与著书立说的史实，采获其导德齐礼之有案可稽的凿凿证据，为李端棻研究领域开出信而有征的学术意见。

一、积学待时与宦海交游

李端棻六岁时失怙，其母独自承担阿保之劳。随后，跟随其叔父李朝仪研习四书五经，在积微成著的铺垫之后，随即向其舅父何亮清领受科举之教。因此才有梁启超的“京兆公（李朝仪）以圣贤之教率其家……公终其生立身事君，大事凛然不可犯，一如京兆公”^①一说，亦表明李氏家族的先人的确有言传身教的道德示范。李端棻晚岁亲自讲与其表弟何麟书，称“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②，此亦可作为其领受家教的确凿证据。为细察其积学待时的史实，有必要在此悉数呈现李端棻于艰辛幼年时目不窥园的笃信好学之表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时年17岁的李端棻进入其舅父何亮清执教的贵山书院，跟随这位日后的翰林院编修学习帖括词章（应试的道德文章规范）。何亮清对执弟子礼的外甥颇为器重，曾赞叹朝经暮史的李端棻：“苾园忠孝之忱根于性生，异日必能为国家尽瘁。”^③何亮清出仕四川之后，李端棻再赴京投其叔父李朝仪门下，李朝仪视李端棻为己出，以一喷一醒的推动督促，使李端棻对经史子集博识多通，其学业进展亦呈竿头日上之势。

咸丰三年（1853年），年方弱冠的李端棻即补博士弟子员（秀才），并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顺天乡试中举，同治二年（1863年）会试连捷成进士，选庶吉士后入翰林院任编修。由是，在以道学吏治闻名于世的李朝仪和奉行经世思想的何亮清的双重“熏影”之下，在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等理学家的器重之中，李端棻的学问日益精进，志向也愈发远大，期许着一个“君圣臣贤”的政治舞台。

除了短时间担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之外，李端棻的宦海生涯主要与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7页。

② 许先德：《贵阳五家诗钞》，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③ 许先德：《贵阳五家诗钞》，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科举密切相关，值得晚清教育史研究者倾耳注目。同治六年（1867年）典试山西，九年（1870年）分校顺天试，十一年（1872年）出督云南学政。光绪四年（1878年）丁忧期满入京，迁监察御史。因叔父李朝仪擢升顺天府尹，李端棻按例回避，重返翰林院，擢升内阁学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内阁学士典试广东，十七年（1891年）典试四川乡试，十八年（1892年）任会试副总裁，二十年（1894年）复典试山东乡试，二十四年（1898年）授礼部尚书。^①这期间与朝野人物在政治上此唱彼和，在交谊上诗酒唱酬的人际交往优势，为其荡平宦海风波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此亦是我們管窺其获致同侪学问规训的路径。

与出使过外国的同僚交往，为李端棻提供了览闻辩见的通道。有如遵义沙滩人黎庶昌曾在光绪初期受命出任西欧四国参赞，历时六年之久，期间游历欧洲十国。李端棻在与其会晤时询问西洋情形，又阅读其手稿《西洋杂志》，两人声气相求。又如与“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黄遵宪的交往。黄遵宪早年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复任驻美国旧金山领事，之后又任参赞随法、英、比、意四国公使薛福成出使英国，再赴新加坡任总领事。李端棻与之会晤于北京，伺机了解国外的森罗万象。^②日后随新出史料，还可以再度证实李端棻受欧风美雨沐浴的铁案。

与出仕的黔籍官员交往，使李端棻领受了前辈的风化教诲。李端棻进京入翰林院任编修之时，其叔父李朝仪颇得朝廷重用，先后在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等地出任知府，忙着行兵布阵、防御捻军^③。其叔父只身赴敌军帐内说服叛将的胆识，对曾寄居李朝仪家中的李端棻，在立身处世上予以了耳濡目染的影响。李端棻丁忧守孝期满返京途中，特地绕道成都拜望在四川任总督的乡贤丁宝楨，领受耳提面命之教。丁宝楨因智杀总管太监安德海而名满天下，在治理黄河、海防建设、革新盐政等方面颇有伟绩丰功，李端棻视其为轨物范世的榜样。^④

从同治二年（1863年）入翰林院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遭免官流放，李端棻

① 张建新：《李端棻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66页。

② 李端棻：《普通学说》，贵阳武庙铅字活版所1903年版，第1页。

③ 李良格、李良筑：《贵阳李氏家谱（第三稿）》，北京大学校史馆藏，第50-51页。

④ 黄江玲、黄万机：《李端棻思想演化历程探寻》，《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第53页。

从政 35 年之久。在朝纲不振、国势衰微的情形之下，他于少年时代磨砺以须，心慕手追叔父李朝仪的道德人生，在寒窗苦读中藏器待时；于青年时代砥节砺行，精诚团结诸多朝野志向高远的同道，以期为江河日下的旧中国尽一份学子之力。此外，还可以继续挖掘李端棻与近代名人的交游故事，从中探察他们为询谋谘度而焦思苦虑的史实，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桴鼓相应之势。譬如，他与贵州学正严修的过从，支持其开设经济特科，以达到“培养天下人才来治天下事”的目的；与同榜考中进士又一同供职于翰林院的张之洞，抨击朝政、坚持甲午海战的主战立场；联袂翁同龢，识拔梁启超，荐举康有为，等等，均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史料。

“宦海交游”可列为窥察李端棻规训同僚的视角。李端棻宦海沉浮 35 年，与政客文人有着良好的交谊。清流派干将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宝廷、邓承修、黄体芳、张楷、邓庆麟、邵积诚等，与李端棻合称“松筠十君子”，他们在济世匡时中砥节砺行。

之后，李端棻名列帝党集团，与翁同龢、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长麟、张謇等因高情远致而道同志合。此外，他还与廖寿恒、张荫桓、谭继洵、陈宝箴、黄遵宪、丁宝楨、黎庶昌等相知有素而惺惺惜相惜。^①

此交代意在说明其交谊圈子为其在位从政奠定了坚实的人脉根基，并得以呈现其学问规训的对象与范围：每有奏折呈递朝廷，总有同僚八方呼应，成为其思想观点的奥援。同僚与之论学有抵牾之时，又常被其精密详备的观点立场所折服：一则李端棻有扎实的学问功底与精深的考证功夫；二则李端棻之陈述能彰显问题意识，能指陈晚清颓废不振、病痛百出的时弊，能一语中的地指明甲午海战之后晚清政治的破局之策；三则李端棻有通权达变的襟怀，并非一味地“尊古抑今”，而是强有力地“申故扬今”。规训本身不限于师长对于弟子，还有道德知识的“掌控者”对于“后知后觉”的知识规训。李端棻对于同僚的规训，于今看来，形式上别具一格，内容上确切不移。

二、规训后学与诱掖后进

① 钟家鼎：《李端棻评传——兼论维新官僚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海南出版社 2004 年，第 14 页。

若以规训理论来审察李端棻的实教从学，难以尽喻其口讲指画的学科规训，亦未见其事关专才孵育的专门理论析出，因为晚清时局给这样一位政治家的重任是辅佐朝廷、力挽困局。李端棻年富力强之时在“金口木舌”的教化事业上的用功，尚需诗新出史料来佐证。本文探察李端棻规训后学与诱掖后进的真相，是从其参与的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中管窥其创造化育的思想脉络。

（一）呈递奏折

《请推广学校折》的全名是《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是一份影响中国近代社会教育体制的重大纲领。它力主变革陈旧的教育体制，提出新式学堂创建的具体措施。这份奏折的写就，是李端棻“念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的危机意识使然。其建言内容不仅涉及变革学校教育的建议，还大胆建倡议设藏书楼、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重大举措，以此发展晚清困厄中的社会教育。如果说《请推广学校折》是一份启蒙朝野思想界的宣言书，那具体的被启蒙对象都是谁？作者认为朝廷的执掌者（皇帝）和权力的掌控者（重臣），民间儒士乡绅和地方各级官员，以及现代学校教育的拥趸均在其列。

其中，又以设藏书楼的事宜最具格局与眼光。李端棻先提出陆续译出西学，又制定发挥图书价值的利用规程，譬如由印书局将西学书籍分送各省，使天下学子“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其次，李端棻在开设书局的问题上颇具前瞻性意识。他感叹先前的西学译著“详于艺术而略于政事”，为达到助益治国、审察时局的政治目的，郑重建议在京师设立大译书馆，分类译出最利于“增益见闻广开才智”的西学经典。至于广立报馆则更见李端棻规训世人的思想。他声言报纸对于开启民智、传播资讯的重要性，即“在上者能措办庶务而无壅弊，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从而达到“识时之俊日多，干国之才日出”^①的政治目的。

（二）选贤使能^②

①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神州国光出版社 1953 年版，第二册，第 296 页。

② 史继忠先生称，他曾经查阅到清人胡思敬撰写的《戊戌履霜录》，书中有《内外荐举表》，开列了各大臣保举的名单，内有仓场侍郎李端棻保举的 15 员：直隶的严修，江苏的耿保贤、崔朝庆、宋梦槐，安徽的程先申，湖南的熊希龄、唐才常、戴修鲤，广东的曾习经、徐勤、欧矩甲、韩文举，浙江的夏曾佑、汤寿潜，“满洲”的寿富。史

李端棻在学官位上二十余年，曾先后担任云南学政，主持山西乡试，分校顺天大试，以内阁学士身份主持广东乡试，主持四川乡试，任会试副总裁等，其主考对象就是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有不教之教的训育便利；他荐举的名士名流，亦颇得其不言之教的道德濡化。李端棻在戊戌变法前，就曾向光绪帝力荐康有为，维新派遭受弹劾之际，他又举荐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入值懋勤殿，可见其称贤荐能的气度；在礼部尚书的任上，他向朝廷保举严修、耿保贤、崔朝庆、宋梦槐、程先申、熊希龄、唐才常、戴修鲤、曾习经、徐勤、欧矩甲、韩文举、夏曾佑、汤寿潜、寿富等维新派人士十六人，亦足见其爱才惜才的胸怀。

他举荐的人中，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明令开设经世致用的课程，增加英文、算学、格致（物理与化学）等课程，赢得“经世学堂”的名号，后来严修自美国考察归来还创办了天津南开大学；唐才常在戊戌变法期间，在湖南创办算学馆、南学会、群萌学会、《湘学报》和《湘报》，组织“自立军”，还在武昌发动“勤王讨贼”；熊希龄在时务学堂任提调，延聘梁启超为中学总教习、李维格为西学总教习，与谭嗣同在长沙创设延年会，认为兴学之本在师范，联合湘绅倡议整理湖南全省的书院；夏曾佑与梁启超、谭嗣同过从甚密，在天津与严复创办《国闻报》，宣传西学、鼓动变法、援引西方学说，形成“民智决定论”的文化史观。以上四个人物，均为艰危时世之伤心蒿目的仁人志士，其人其事当是李端棻规训后学生发效用的重要凭据。

（三）学堂讲课

退居贵阳之后，李端棻参与学堂创建、学堂主讲、课程教学，用近代先进的学科知识训练学子，开启了贵州文教振兴的先河。李端棻刚回贵阳便欣然受聘于贵筑经世学堂。出于对他高山景行的仰慕，贵州书香世家子弟聚集在其周围，朝夕领受他的桃李之教。其中，最突出的六位青年才俊是姚华、唐尔镛、王仲旭、任可澄、何麟书和桂伯铸，他们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贵州乡试的前六名，日后在贵州近代均有不俗的事功。^①有学者称李端棻经受“欧风美雨”的洗涤，熟谙西方教育制度与教育典籍，譬如卢梭的《爱弥儿》、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培根的《论事物的本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包尔生的《伦理学》等名著，他

继忠：《李端棻举才》，《贵州文史天地》1998年第4期，第48页。

① 何克勤：《真情绵绵无绝期——记何亮清、何麟书父子与李端棻》，《贵阳文史》2010年第5期，第34页。

都曾熟读，^①此外，从李端棻晚年在贵筑经世学堂主讲西学的内容，与他1903年撰成《普通学说》，可以推断他所具备的西学功底足以推动西学知识的散布。明证就是李端棻曾专题主讲“卢梭论”“培根论”，并大力宣介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

（四）兴办教育

李端棻参与兴办教育至少有两个维度的表现：一是《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的通过奏折来提出教育改良意见，即经由改革课程来改造传统的书院以达到办成新学堂的目的，这是他思想层面参与兴办教育的例证；二是在学官任上和避居贵阳之后的身体力行，受聘经世学堂山长，参与乡绅儒士的办学活动，并积极撰写《政治思想》《国家思想》以唤醒世人^②，这是他实践层面参与兴办教育的例证。之后，李端棻在贵州鼓励有志之士办教育，使华之鸿、任可澄、唐尔镛、于德凯和何麟书等参与兴办新式学堂，成为李端棻思想“最快与最彻底的接受者和实施者”（何克勤语）。数年间，几百所各类学校在贵州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深刻地影响贵州各类教育的历史进程。譬如，贵州陆军小学培养的学生，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大潮中，打响了贵州巡抚衙门的第一枪；贵州通省公立学堂更是延揽人才，成为因材施教的教育重镇^③，并促成近代教育体制在贵州的落地生根。他支持学子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促进了贵州知识阶层的觉醒，为清末贵州教育改革的兴起，储备了先锋式的人才。

李端棻的教育主张演变为教育实践，在贵州的具体表现就是：改书院、推广学校、改良经世学堂、发展官书局、选派游历。其中，选派游历有力地表明了李端棻借此来规训学子的孵育思想，他认为设置同文馆、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

① 何克勤称，65岁高龄的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之后被流放新疆，在流放的三年他对自己参与、策划与推动的戊戌变法做了深刻的反思，在此期间深刻地学习欧洲民主思想启蒙家卢梭、培根等人的著作，完成了从一个“失败的封建上层改良主义者”到一个“民主先驱”的思想变革。参见何克勤《真情绵绵无绝期——记何亮清、何麟书父子与李端棻》，《贵阳文史》2010年第5期，第33页。

② 在李端棻的诗歌中有“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同胞若识平权义，高枕无忧乐自由”“君不堪尊名不卑，千年压制少人知”等，表明其政治思想和国家思想中有受西方政治学说启迪之后的品格跃升，表现为对清王朝家天下和帝王专权的否定。

③ 何克勤：《真情绵绵无绝期——记何亮清、何麟书父子与李端棻》，《贵阳文史》2010年第5期，第34-35页。

学堂等，有其规训人才的局限性，那就是受到书斋的拘囿，于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弊端在于“未遣游历”，故在避居贵阳之后亲自促成 1905 年春夏 78 名学子出国深造，又在秋冬促成 73 名学子赴日留学。这些学子中的绝大多数日后归来，成为振兴贵州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三、知识规训与思想启蒙

著名教育学家瞿葆奎撰文称，学者陈鸿祥所著《王国维全传》一书中“王国维 1904 年曾任教的江苏师范学堂是全国最早的管办师范”有误^①，因为李端棻在 1902 年创办的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以及张之洞在 1902 年创办的湖北武昌师范学堂、陈宝琛在 1903 年创办的福建全闽师范学堂、张謇 1903 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南通）、袁世凯 1903 年创办的直隶保定师范学堂等才是中国晚清最早的一批“官办师范学堂”，均在端方 1904 年创建的江苏师范学堂（苏州）之前。

陈述这段学案的意义在于，声明李端棻创办的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具有中国近现代教育上的先驱价值，它不但有践行《请推广学校折》之教育主张的地方回应动作，而且有对近代学校教育中的学制规定、教习聘请、生员资格、学习内容、专业分科、毕业待遇及经费来源等具体问题的落地生根。在李端棻的切实领导之下，创办群体勾勒了一个官办师范学堂的体制轮廓，并推行近代学校教育的规训制度，以期实现李端棻提出的“十年之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的教育目标。

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乃私人集资筹建，校牌却以“公立”示人，学堂宗旨宣称：“以忠君爱国为本源，教授中学以上诸学课。”开设的课程有：“日文、化学、博物、万国历史、中国历史、万国地理、中国地理、地文学（兼天文学）、生理学、算术、代数、几何、法制学大要、国家学大要、国际公法大要、教育学、图画学、体操学。”考试评点方法为：“学生在学期间，实行学期试验、学业试验、卒業试验三种。成绩以‘评点’方式核定，每科以二十点为得点。其得点各科平均不达三分之一者，为不及格。”学生守则：“要求学生充其固有之良知良能以为学，而又必忠信、笃敬、持重、廉耻，与同学互相砥砺。如有：一、品行不正，才学浅劣，前途无中学教习之望者；二、徒知放议时事，怠于讲习者；三、屡犯堂规，懊悔无望者。经教习与总理副办会同商议，命其退学。”^②从上述章程的具体内容可见办学者在作育新人上的良苦用心。我虽不同意秋阳判定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相当于大专层次的办学水平，但其开展知识生产与培养

① 瞿葆奎：《两个第一：王国维译编的〈教育学〉——编辑后记》，《教育学报》2008 年第 4 期，第 4 版。

② 秋阳：《李端棻传》，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4-155 页。

新人的学科规训制度，实是有案可稽的近代学校规训制度典范。

彼时因八股文废除而代之以论说文，又实质性地参与规训后学的月课，足见李端棻的开明思想。又如他第一次月课即以“卢梭论”为题，第二次月考又以“培根论”为题，第三次月考再以“朋友相处，常常自己的不是，方能感化他人的不是说”为题，颇可表明开通黔中风气、提携后进的教育意图。至于阐发的民权自由思想则更是其规训后学的实质内容。^①再如，他在学堂对于卢梭《民约论》中的“天赋人权说”与自由平等思想的散布，在私宅对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的宣讲，着实影响了一批青年才俊。

李端棻一生虽无等身著作，但有值得教育学者关注的高文大册，譬如传世的《苾园诗存》和《普通学说》，均被认为是研究李端棻的珍贵史料。《苾园诗存》由其表弟何麟书辑录成书，所录诗歌虽多为其晚年对家国寒心销志的寄怀之作，但亦可见他从帝党官僚转向维新派并勉力规训后学的心理历程。譬如，在《应经世学堂聘》中，他借山长之位陈述自己离经辨志的教育抱负：“帖括词章误此生，敢膺重币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②再如《学术思想》中，他感喟维新变法给教育以时至运来的转机，指正“虚空”之学误国误民，推出炼石补天的金石之计：“早知素习尽虚空，志积维新日有功。目的胡为犹惆怅，心思毋乃欠昭融。素王学术无今古，黄种灵明胜白棕。宗旨看真须取法，何妨时势造英雄。”^③

《普通学说》是李端棻规训思想最集约的表达，其刊印初衷在于帮助无条件入学的寒门子弟自学新学基础。关于这个 6400 字的单行小册子的编纂缘由与意图，李端棻做了如下陈述：“还乡以来，瞬将二载，睹吾乡人士未尝不思为学，而或蔽或偏，莫能自拔。不揣固陋，竭其所知，以与为学诸君共求进取之途，著之于编，以共众览。”“自严范孙编修督学以来，人始知学，至于今日，空疏如故。不喜西学者固无论矣，即号知西学者亦只从数种报章少开知识。即而扣之，不特专门之学未之有也，即寻常之普通知识亦未之前闻，甚至本国地理、历史，不论新学、旧学悉应通晓者，亦多相对茫然。”^④即李端棻欲借为学的基础——“普通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以规训黔中子弟。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图书的途径与目的：救时和穷理；第二部分讲普通学说的分科：理化生、政法经、史地、博物与伦理；第三部分讲彼时中

① 秋阳：《李端棻传》，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6-157 页。

② 许先德编：《贵阳五家诗钞》，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 页。

③ 先德编：《贵阳五家诗钞》，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 页。

④ 李端棻：《普通学说》，城北官书发行所 1903 年版，第 1 页。

国教育改革的阶段与区分，激励黔中学子奋力直追东南士大夫的兴学盛况。全书犹如匕首投枪，击中黔中教育的要害，同时亦显示出李端棻接受东洋、西洋之现代科学的自我规训格局，在国势衰微之时借力规训后学以大展经纶的政治谋略。

作为帝党官僚的李端棻与时俱进，渐变成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官僚，从其一生致力教育与政治之双向径路的救国强国的政治诉求中，足见其美人香草般的赤子之心。他不仅奥援维新变法的志士仁人，而且规训有志于学的四海学子；为学为文均有高明远见，为官任上则行不苟合，作育人才更是桃李满天。李端棻不仅是反哺故土的黔中乡贤，更是扶危定倾的华夏榜样。

李端棻乃科举出身，深知科举取士的弊端，故其改变时局的动因和举措乃其自身体会良多的“困厄感”使然。他深知不可再延续坐而论道般的僵化培育模式，而需抢占孵育“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的教育制高点。他一生的教育实践表明，其规训自身与规训他人的自觉自识意识都很强烈。

